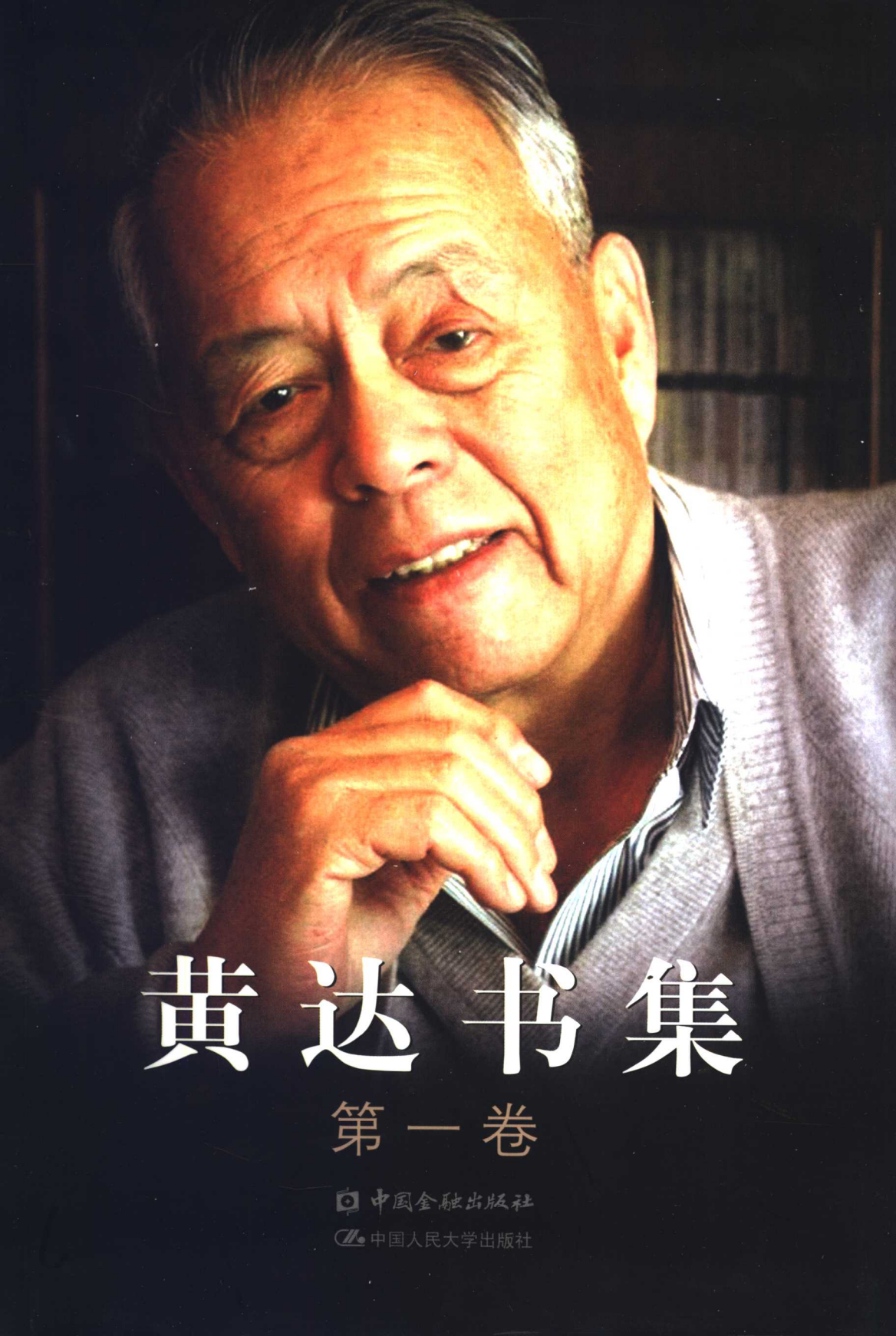


A close-up portrait of an elderly man, Huang Da, with a thoughtful expression. He is resting his chin on his clasped hands. The lighting is warm and dramatic, highlighting his face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He is wearing a grey sweater over a striped shirt.

黄达书集

第一卷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达书集

HUANGDASHUJI

第一卷

I 《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

II 《货币信用学》（上册）

RBI 13/01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总策划：林铁钢

责任编辑：赵天朗

美术编辑：吴锦明

责任校对：潘洁

责任印制：程建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达书集. 第1卷/黄达编著.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4

ISBN 7-5049-3652-9

I. 黄… II. 黄… III. 金融学—文集 IV. F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0077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3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72190 (010)66070804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010)82672183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55 毫米 × 235 毫米

印张 16

字数 526 千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0.00 元 (1~6 卷)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足 迹

——《黄达书集》说明

我自己的经历可以说是从事金融学科——其中主要是《货币银行学》——教学的经历，也可以说是环绕教学，从事金融学科、经济学科研究的经历。而我的教学、研究生活，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从1950年开始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教学单位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一直把《货币银行学》—《金融学》以及相关金融学科课程的建设作为中心任务。作为这个群体的最初拓荒成员之一，我的主要精力也始终倾注于这项中心任务。

在从事金融学科教学近55周年的历程中，筚土跼步，写了一些文章，先后编入《黄达选集》、《黄达文集》；同时编、著、译了以提供教学资料为主要目标的十一本书。教材的编写，依靠的是群体的集体力量，即使是个人完成的文章和专著，如果没有群体营造的相互启发、讨论指点、督促鼓励的学术氛围为依托，也是不可想像的。

在行年已逾80之际，为了回顾自己的教学研究历程，也是为了

给金融学科教师群体建设《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的轨迹留下一个纪念，特把十一本书编为《黄达书集》。

在此，对出版这部《黄达书集》的中国金融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致谢。

下面，从历程、从轨迹的角度，对这十一本书做些说明：

（一）《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

建国伊始，明确的是全面学苏联，金融学科的教学也不例外。当时，苏联的货币信贷专业（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金融专业）开设《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两门主课以及信贷、货币发行、现金管理、银行会计等几门业务课。1950年秋季学期，人民大学即开始以“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为主，全力组织翻译苏联著名院校编的金融学科教材。既供本校教学之用，同时也供全国金融教学使用。

其中选用了当时苏联的一本最知名的教材——【苏】布列格里：《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这部教材的理论主干是马克思的货币银行学说；同时包含相当全面的市场经济货币银行的基础知识。虽然今天看来有许许多多由于政治环境决定的论断，但无损其作为一本基础教材的价值。不过，原作者的表达方式和生涩的译文，当时中国的学生接受起来比较吃力；而西方世界金融领域不断出现的新进展也需要补充。因而决定以这本苏联教材为蓝本，编写一本中国学生易于接受的教材。

设想早在1951年提出，实际开始动手是在1954年。当时，我任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主任，主持这项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周作仁、杨承祚、黄达、林与权四人。周作仁老先生留学德、美，是建国前最知名的货币银行学教授，分工起草几章的改编稿；杨承祚老先生留美，熟悉国际金融情况，在闭关锁国的困难条件下搜集了大量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的新资料，使教材充实了新内容；黄达、林与权分工改编大部分章节。统稿由我负责，林与权同志协助。1957年1月、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上下册出版；同年5月，合为一册出版发行。全国普遍采用，直至改革开放之初。

这是我第一次主持编写出来的公开发行的教材。那时没有复印技术，初稿必须抄录后才能统编；统编稿改动多了，还需重抄、再重抄。1955年中到1956年，由于政治运动，停止了我的一切教学和集体活动，但不干预闭门写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全力投入这本教材的编写。当收到出版社发行的这本教材时，不禁在扉页上写下：“……两年半的经营近日方始出版，方知编书之不易也！”

（二）《货币信用学（上册）》

在改编《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一书的同时，还存在另一项任务，那就是参照苏联的《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课程，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苏联这门课包含“史”、“论”两部分。史的部分是以十月革命前后为起点讲苏联货币信用制度的形成和政策演进。对于我们来说，有没有苏联的“样板”，都要编写新旧中国的货币银行史。这项工作，实际上从1951年即着手进行。问题是“论”的部分。苏联教材中的这部分，用大量篇幅反复讲社会主义货币、信用、银行的优越性，而关于机制、规律方面内容，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课程比较，没有多少新的东西，甚为单薄。我们当时的确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对于只是重复优越性而讲不出什么机制、规律内容的课程，非常怩头上台，当然也更难以推进教材建设。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我的同事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是否把两门课（“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并成一门课？在当时，这种想法颇有“混淆”两种社会制度“本质区别”的政治风险。

1958年的“大跃进”中，有一个“解放思想”的口号。它鼓舞我们把突破苏联框框的想法付诸实践。我先是在校外，用两课并一课的讲法试讲了几讲，随即在教研室组织两课并一课的《货币信用学》的编写。其所以未采用“货币银行学”的名称，依然是想与西方课程有所区别。

1959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货币信用学（上

册)》。书中论点已不完全照搬苏联——有了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的体会和根据中国情况自己概括出来的看法。其中第二篇是过去教研室编写的有关中国货币信用制度发展历史的三章讲义。这三章讲义从1951年开始编写，以后历年修改、增补，并曾多次油印供同学参考和分送给兄弟院校征求意见。

在这本书的“编者的话”中，指出教材内容的第一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货币信用基本原理的论述”。现在对于这句话的解读可以是：这本教材要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在货币银行领域中共同的东西。也正是由于隐含的这个意向，曾一度遭到持续半年的“严厉”的批判。

由于1959年秋的“反右倾”政治运动，下册未能出版。

后来，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阶段，不少兄弟院系编写的教材也采用了“货币信用学”的名称。

（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和货币流通》

1960年年底之后的两三年，中国经济学界曾获得可以对经济理论进行冷静反思的氛围。在这期间，我和我的同事没有急于重新拾起教材的编写，而是想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从理论上进行反思，以期为下一步的教材建设打基础。在这期间，我写了一篇引起同行争议的文章《银行信贷原则与货币流通》和收入本《书集》的这本小书。

这本小书的内容，今天看来，没有多少可以称道的地方。不过对我来说，十年多的金融学教学积累了一些体会，而五八年的大跃进，或许以其反面教训促使自己大大加深了对经济规律的理解。虽然，当时社会、政治大背景的约束还是限制着思想认识的进展，但无论如何可以说多少有了自己观察、剖析经济金融问题的独立视角。

如果要考察那时金融学界的状况，这本小书也还能够提供一些信息。

这本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64年3月出版。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

这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一本书。原著者弗·米哈列夫斯基在苏联是辈分很老的一位经济学家，著名的黄金问题权威。1952年出版的这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是他谢世前最后的一本专著。之前，他还有两本有关黄金的书：《黄金是货币商品》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黄金》。

其所以翻译这本书，一方面是想巩固和提高自己通过一次暑假速成和几年自学的俄语水平。但更重要的，是想深入一步地掌握作为“货币商品”的黄金的知识。

在20世纪50年代，有过一次人民币是不是黄金符号的讨论。就我的认识来说，包括矛盾的两方面：

一方面，通过学习马克思的著述，我完全信服马克思极其严密的逻辑推导：用纸印制的钞票只能是货币商品的符号。当时，存在着人民币不是黄金符号的主张，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过却没有像马克思那种思辨水平的论证。那时，与其说我的强烈意向是维护“人民币是黄金符号”的论断，不如说是想指出：如果不能在马克思的逻辑推导链条中找出可以否定人民币是黄金符号这一论断的某个环节，那就不能否定这个论断。

另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调控货币供给和物价水平所实际依据的公式是：

以纸币所表示的商品价格水平 $\times$ 商品数量 = 纸币数量 $\times$ 货币流通速度
换言之，就是根本不把黄金考虑在内的交易方程式。

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推动我企图从逻辑上协调矛盾的两方面（那时在苏联也有学者做过这样的研究）。我的这种努力开始反映为《人民币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的符号》一文，随后反映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与货币流通》的第三章，并一直保留到下一本《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之中。

然而，我自己也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这也就是使我产生了进一步探索黄金问题的强烈欲望。

那时，刘鸿儒同志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也想翻译点学

术著作。他很支持我组织翻译这本书的计划并翻译了几章。

在翻译的过程中碰到许多难题。主要有二。一是我对西方的情况极不熟悉；二是该书许多表格应该补充出版后的数字。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从教的项冲教授和陈今森教授给予我极大的帮助，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需要交待一句的是：本来的出发点是期望通过翻译这本书可以对黄金与人民币关系这个理论问题取得提高一步的理解。遗憾的是，在这个主要目标方面，基本没有什么直接收获。不过由于翻译这本书，使我了解了许多西方国家的金融情况，学会了使用一些西方有关金融的工具书，受益极大。

这本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65年10月出版。

（五）《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

这本书虽然是1990年出版的，但写作却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73年。

那时，我是处于既非“革命群众”又非“批斗对象”的“挂起来”的境况。没有经过那场动乱的不太容易了解这是一种什么“境况”。粗略地说：1973年的我，无权参加集体活动；除日常生活，如上街购物、吃饭、探视老母亲外，也不允许“乱说乱动”；但却有几乎百分之百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并允许到图书馆看书。也正是这样的特殊条件，才有可能针对多年前一直打算探索的剪刀差问题，安安静静地从事基础的统计数字整理并做出了一些判断。

关于为什么对剪刀差问题有兴趣以及写作时的具体环境、条件，本书《出版时的几点说明》中有较详细的解说。

出版这本书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六）《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

这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十年动乱”结束后立即着手编写的第一本教材。

197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招生。

原来从事金融学科和财政学科教学的教师们，为了总结“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教书的心得以及十年动乱促使对社会发展的全面重新思考，决定编写一部教材——《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

开始参与讨论、酝酿的教师甚多。后来商定集中由黄达、陈共、侯梦蟾、周升业、韩英杰起草，并由黄达负责统编定稿。关于这本书写作的缘起、前期研究、内容设计、重大疑难问题的处理、写作分工及处理统稿的约定等，均见于本书的作者《说明》。

这部教材，首次建立了一个把货币、价格、资金（公司理财）、财政、金融连结为一体的学科体系，并从经济生活中货币层面的宏观均衡（综合平衡）论证了对这些范畴进行综合研究和教学的必要性。这样的思路在改革开放 20 余年后的今天依然成立。

全书的设计，可以说已经完全摆脱了建国后金融教材的苏联框框。立足于中国土地的准则，始终贯彻全书。

在改革开放之初，这部教材为经济、财政、金融等相关专业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财政金融理论知识。在没有其他相关教材可读的情况下，20 世纪 80 年代初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大多读过这本书。不少人至今对之依然记忆犹新。

这本书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 1981 年 7 月、8 月分上下两册出版。

（七）《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

20 世纪 70 年代 80 年代之交的这几年，在改革开放的冲击下，经济生活相继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日益加重的物价波动和通货膨胀威胁、银行信贷规模的急速扩张和信用膨胀、变得难以把握的货币供给、财政收支从结余迅速转为赤字、利用外资的从无到有以及是否可以同人民币脱钩……如此等等，推动自己思考、推动自己写作。

《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的第五篇已经涉及其中的颇多问题。但限于篇幅，限于匆匆发稿，来不及深入推敲。面对大量接踵而来的新问题，日益明确必须建立能够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系统中加以分析的框架。应该说，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我国理论界就提

出了一个框架——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是如何按照“系统”的要求使这个框架得到逻辑的论证——凡纳入这个框架的问题均能用协调一致的思路进行剖析并得出相互呼应、补充、兼容的论断。目标或许过高，但不论是否达到，确是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写作主要是在1983年。这年整理出授课用的打印教材，题目是《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再探索》。1984年出书，定名为《导论》。遗憾的是，在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之后，原定的目标没有坚持继续深入、继续完善。1984年出书后的20年间，虽然笔耕未辍，但自己总感到没有能够再次达到这段研究所曾经达到过的水平。

这个分析框架是就计划经济体制搭建的。但计划经济体制中一直存在总想否定却总也否定不掉的“商品货币关系”。因而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个大框子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商品货币关系不能不是商品货币关系一般里的一个特例。计划经济的特点之一是生产关系极大的简明化；相应的计划经济的商品货币关系也是最大简明化的商品货币关系。就这个极其简明的关系分析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线条清楚；而由于它本质是商品货币关系，因而据以得出的论断则具有适用于一般市场经济——不论其经济结构如何复杂——的意义。假如没有十月革命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谁也建立不起十几亿人口的计划经济社会制度的“实验室”。而当人们反复论证这个实验是不成功的实验时，却不怎么重视这个难得的实验室使得人们能够得出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费极大力气才能得出的理论论断。当我大量接触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时候，感到正是对计划经济综合平衡的研究帮助自己有可能很快地进入他们的境界。

这本书由中国金融出版社于1984年11月出版。

（八）《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修订版）

这本书的初版是1997年，比《货币银行学》晚5年。但写作的开始则可回溯到1984年。

1984年《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出版后，即以这样的课程名称授课，并思考如何对《导论》作进一步地修订、增补、提高。然而，实际过程却发生了变化。正如《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作者的

几点说明》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关注点也日益转移到改革和建设思路的剖析、发展趋势的估价和主要症结的把握等方面……由于主要精力不是集中于学科体系建设，从而原来的设想没有能够实现。”

就基本思路来说，这本书与《导论》一脉相承，但引述《导论》的具体内容不多。

由于在多年与决策层、与民意代表、与经济工作者、与经济学界、与各层次经济专业学子的接触中，一再感到，涉及金融的不少问题，其所以说不清道不明，主要症结之一是没有全面把握现代信用体系创造存款货币和钞票的机制。因而这方面的内容构成本书的主要章节。

另外，有一部分是剖析人们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主要是分析货币供给问题但决不限于货币供给问题的宏观分析方法。这是多年教学的心得。自我感觉多少有点价值。

这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2月初版，1999年7月出修订版。

（九）《货币银行学》

这本教材于199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经过全面的修订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按照教育部的统一版式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版。收入本《书集》的是1999年经过全面修订的版本。

编写这本教材的大背景是：改革虽然是渐进的，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体制的变化已经很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趋向事实上逐渐明朗——虽然在提法上还未能捅破这层窗户纸。《货币银行学》课程已多年列入教学计划，但教材，本土的、引进的，杂陈于书桌之上：“本土”的，内容失之于依然受到过去框框的约束（如不少教材依然是苏联老框框——区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难以适应改革的需求；翻译的书是外国教授以外国为背景写的，最容易造成的学习结果是——只是慨叹于中国实际落后于书本原理；学在本乡本土，却不了解国情。从而金融学

科教师面对的形势是：要在中国的讲坛上，结合中国的实际，面对中国的学生，讲授先进的《货币银行学》。为此，就需要编出反映这样要求的教材。

直接的推动是，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中国大学发展项目”，组织中外教授讨论中国大学财经类专业教学计划，并提出了十门核心课目录。核心课中就包括《货币银行学》。会后教委组织各大学分别提出自己有关各门核心课程的提纲进行教材编写的投标。当时，如何设计“中国的”货币银行学，还是一个新课题。各院校的金融专业对之好像准备不足：提出的提纲只有三四份，反映了那时的思路——意欲摆脱原有框架的桎梏但尚不成熟的思路，却都不理想。最后人民大学金融系中标。

对于货币银行学的框架，当时有种种主张。如其中一种，主张开篇不是货币，而是金融市场，或其他。这类主张多是看了一些西方的教材却无深入研究，也提不出内容的系统安排，即使提出，也属“感想式”，无操作基础。我们的考虑，现在回想起来，大体的思路是：（1）尊重自己多年的教学积累，并以自己对这门课的领会、理解为“主心骨”；（2）尽力借鉴、吸收西方知名货币银行学教材的内容；（3）力求简明地把中国金融领域——今天的和建国以来的——背景交待清楚；（4）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的精神实质，不教条也不为改革后简单排斥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潮所左右，并始终贯穿改革的精神。当时还有一种说法：西方已有很好的货币银行学教材，自己编写能编出什么新东西。针对这些不同看法，我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建国以来〈货币银行学〉课程发展的回顾及如何进一步建设》¹。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编写这本《货币银行学》指导思想的表达。当然，今天看来，有些提法带有20世纪80年年末的“时代”印记，但并不影响基本思路。

（十）《金融一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

这是一本文集——从1999年初到2001年中的论文、讲演稿、

¹ 见《黄达文集（下）》第638页。

讲课稿、会议发言的汇集。如果说特点，那就是把讲演、讲课使用的透明胶片和幻灯片也搜集进来了。内容主要是两方面：其一是金融形势和金融改革；其二是金融学科建设。

关于金融形势和金融对策，主要是环绕这一期间不期而至的通货紧缩问题摆摆自己的看法。其他有关金融形势和金融对策的文字都是延续此前的观点。

文集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金融学科建设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始于2000年7月，在中央财经大学为教育部财经政法处组织的教师培训班上的讲演《金融学科建设若干问题》，止于2001年5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的讲演《金融、金融学及其学科建设》（收入《金融一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文集时用的题目是《金融学学科建设设想》）。经过这段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编写《金融学》教科书的构思。

这本书由中国金融出版社于2001年9月出版。

（十一）《金融学》

面对21世纪，全世界金融学科飞速发展，我们对金融学科的理解明显提高；中国日新月异的金融发展要求在学科建设中得到充分、及时地反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金融学科的建设必须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成为金融学界的共识。

1997年，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时报等单位举办了“97中国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研讨会”。以院校和科研部门为主的金融学界老年、中年学者大多与会，对21世纪的金融学科建设各抒己见。在这先后，规模大小不一的研讨、座谈新世纪金融学科建设的方向、重点和规划的活动还有几次。2000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邀请金融学界的中年学者，其中主要是兄弟院校的教学骨干，讨论建设金融学科和重新编写货币银行学教材的指导思想。会后，人大财金学院决定着手编写《货币银行学》的“升级版”——《金融学》。

这本教材如何建设，有些问题在酝酿讨论中比较易于明确。比如仍然应该延续《货币银行学》的编写指导思想；比如应该设计一

个最为合理的内容取舍和篇章安排的框架，等等。但这时却需要解决一个有些突如其来的特殊问题：什么是“金融”，《货币银行学》是否是金融学科，宏观调控的活动——如中央银行的活动——是否不属于《金融学》的对象，等等。在1997年前后，也就是大量海外学子归国任教、任职之际，这个问题即已提出。西南财经大学的研讨会上就有不同看法。我一直主张不要过多地陷入概念、界说（如什么是金融，什么是通货紧缩……）之争。那时我的发言题目是“最重要的是学科内容的建设”。然而，到了2000年，环绕金融界的种种说法对教学界的冲击越来越大，以至各高等院校金融专业的目标也在议论要重新考虑。自然，我们要编写《金融学》的目标能否确立更成为问题。²这样的混乱无法回避，必须正视，必须加以澄清。

要讨论这个问题，涉及我们是否把握了：西方 Finance 这个词的多重含义、多重用法；在西方不同人群、不同领域习惯所指的范围；在西方经济学科里，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 和 Finance 研究对象的发展演变，等等。也涉及中文“金融”这个词产生于何时，这个词含义演变的历程；近几十年人们对这个词的习惯理解和用法；这样的理解是否反映客观事物的客观性质；为什么也就是几年之间突然出现这么大的歧义？还涉及在联系东西方文化平台的翻译桥梁中，处理 Finance 的“西译中”和“金融”的“中译西”应该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如此等等，要调理清楚，不能不投入精力；而且对实际已经存在的不同用法也需要有个应如何对待的思路。

在2000年7月的讲演《金融学科建设若干问题》中，就是首先从讨论这个问题切入的。尔后，访问了西南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与各校金融教学同行当面交流切磋。那时各校金融专业也多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学术问题不会定于一尊，但求同存异，也必须弄清楚“同”在何处，“异”在何处。由于同行间的讨论有的放矢，逐步深入，收获极大。

2 期间还穿插了一个“必须抛弃银行”的说法。

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对金融界说的观察视野进一步开阔，《金融学》的框架设计也最后形成。这些均反映在《金融一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文集的有关文字和幻灯片，特别是在《金融、金融学及其学科建设》（《金融学学科设想》）一文之中。

2001年年中，开始这本教材的编写，2003年年中出版；2004年年中出版《金融学（精编版）》。在这三年间，与金融教学界，对“金融”和《金融学》依然有断断续续的讨论。2004年暑期，在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组织的讲习班上，我讲了一堂课：“金融学·导论”（副标题是从《货币银行学》到《金融学》），可以说是从2000~2004年编写《金融学》这本教科书的总结。³

黄达

2005年3月

3 讲课的幻灯片可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网上查找。

编 者 的 话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为了供财政信用系同学和函授生学习“货币流通与信用”课程的参考指定我们编写的。

本书的内容主要是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关货币流通与信用方面的理论。围绕着这一中心内容还阐述以下两方面的问题：（1）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信用制度的构成及其各环节的作用与业务；（2）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信用制度的状况及其被财政寡头利用来获取垄断利润的途径。

本书的体系是以苏联兹·阿特拉斯和艾·布列格里等教授在1955年集体编写的提纲为依据，并参酌我们在教学工作中的体验而确定的。编写本书所采用的材料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出于布列格里教授所著《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一书（1950年版与1955年版），其中不少地方是整段引用原文而只在文字方面作了某些加工。

此外，我们还把布列格里教授原著1955年版的第十一章和第十四章（对资产阶级货币信用理论的批判和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信用制度各论）译出附后，以供同学们深入钻研时参考。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教研室的同志，尤其是项冲同志，在体裁和内容方面都给予了很多的帮助，程曙光同志也参加了个别章节的编写工作。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不吝指正。